

由吕剧《大唐黜官记》言 及新编历史剧创作

◆王蕴明



王蕴明，山东省莱阳市人。1964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工作室副主任、艺术处处长、《新剧本》、《戏剧评论》副主编、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北方昆曲剧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专著《戏剧批评论纲》、《当代戏剧审美论集》等。

由孙悦遐编剧、谢平安、周丽斌执导、山东省吕剧院演出的吕剧《大唐黜官记》，叙说的是这样一段故事：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新皇李世民登基，满朝文武山呼万岁。探马忽报，突厥可汗颉利率大军数十万入侵，已到京畿（长安）渭河之畔，满朝震惊。李世民急呼宰相，不在。再呼大将军，不在。又呼司空，仍不在。原来宰相、大将军、司空三位当朝最高官职皆由开国元勋、年迈（挂白髯）的裴寂一人兼任，而裴寂此时正在为新皇登基到江南征招美女返京的路上。待裴寂还朝，新皇讯问退敌之策，裴寂竟献策迁都，还有一班老臣也附合，这令李世民大跌眼镜。李世民便令裴寂领兵退敌，自然被颉利打得丢盔卸甲，滚落马下。幸有大将尉迟敬德、能臣房玄龄及时赶到与李世民共同设计却敌。而裴寂竟在一批昏庸老臣的阿谀中自诩得胜回朝，这令李世民十分震怒，当即将其解职令其还乡，并决定罢黜一批冗员，起用新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裴寂与这批老臣（李仁发、封德彝、权万纪、柳濡）一齐到太上皇李渊处告状，李渊庇护这批老臣，自然不赞同。李世民便令裴寂与房玄龄分别筹划简政方略。裴寂回府，拜访之官络绎不绝，不分昼夜，送礼走后门，以保不被罢黜。自己嫁出的女儿也回家要求给女婿加官晋爵。弄得裴寂一筹莫展。在夫人的劝说下，裴寂醒悟，遂上朝请辞还乡。回乡之日，昔日阿谀逢迎的亲近故交竟无一人送行，裴寂正感无限凄凉之时，李世民亲至长亭，置酒为其饯行，顺便让其把征招来的美女送回原籍。君臣由此心相通，情相融。

此剧创作于上个世纪末期,新世纪初山西一地方剧院初排,山东吕剧院再排,先后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2010年)和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2011年),获文华剧目奖与中国戏剧奖、剧目奖。

该剧的艺术优长在于:一是故事叙说明达晓畅,无阻隔。情节编排一波三折,迭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虽系类型性格,但有明晰定位,亦不乏心理描述。二是剧作的立意切近现实,时代感强。革除旧弊,启迪新思,精兵简政、培养青年、选拔后俊,正是当今社会所必行。三是全剧采用轻喜剧的艺术风格,在该谐风趣的情境中进行褒贬,平添了戏剧的观赏性。四是音乐唱腔较传统丰厚新颖,又不失本色韵味。舞美服饰亦简洁大方,疏密得体。五是演员阵容整齐,几位主要演员均表现不俗。吕剧擅于表现民间家庭伦礼、男欢女爱、地域风情,袍带戏并非其所长。但该剧演员对人物形神的体现、舞台节奏的把握、戏剧情境的营造、唱念做舞,均能应对自如,不生涩,与当今擅演袍带戏的京剧、梆子优秀演员相较,足堪伯仲其间。

这里可以讨论的是关于历史戏创作的美学追求问题。新编历史戏的要点有二:

其一,古与今,即历史题材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作家选取古代的人与事或者观众观看历史戏,固然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历史知识,但决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或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理念,或是借古喻今,张扬一种社会的审美理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使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赞扬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念旧的斗争,是为了赞扬想象中的既定的任务,而不是为了避免这个任务在现实中的解决——是为了重新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使它的幻影重新游荡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89])但这种借古喻今,不应是简单的影射比附,不应将历史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马克思),作者的观念“要让他自己从场面中流露出来”(恩格斯)。在这个层面上,《大唐黜官记》的作者是十分清醒的。很显然,她的创作动机就是借古喻今,为当今精简机构、提拔青年后

俊张目,“是为了赞扬新的斗争”。同时也在人物的塑造上作了努力。对裴寂奉命罢黜官员而面对众多打关节的亲朋故交的尴尬心态和告老还乡门庭冷落的凄凉心境的状态,是颇具见地的。

其二,史与戏,即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就近百年来以历史题材创作立得住的剧目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谨的历史剧,或曰历史正剧。即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社会背景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尤其是史有实载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要有历史依据。即所谓的大事不虚。这既为尊重历史,又为给今人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作家还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评判、剪裁。在这里,作家的艺术虚构亦是必不可少的,即所谓小事不拘。因为要让死人活起来,必须写出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情感心态,要通过细节强化他的独特个性,这在史料中是难以见到的,至少是不充分的。但这种虚构一定要符合历史的规定性,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是符合剧中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征的。二是历史故事剧,或古装戏。即摘取历史上的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或假托(虚构)某一人物,演绎一段或舍己救人或悲欢离合或男欢女爱的人间情事,表达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与审美理想。在这里,作家拥有更大的虚构空间,只要剧中的人物、情节大体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三是戏说,一般是以喜剧或闹剧的形式,以娱乐为主旨,假借一段历史人物与事件。只要历史观是正确的,艺术趣味是健康的,可以天马行空。

就《大唐黜官记》的题旨、人物、事件而言,显然是一部历史正剧。剧中的主要人物裴寂、李世民、李渊、突厥可汗颉利、房玄龄、尉迟恭、封德彝等都是主宰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李世民的并省减员、与北方少数民族突厥之间的战争也是史有实载的重大历史事件。问题是剧中的具体描述与史实相距甚远。据《新唐书·裴寂传》与《资治通鉴》载:

裴寂原为隋朝晋阳行宫的副宫监,与时为

隋朝晋阳太守的李渊相处甚厚,两人曾饮酒通昼夜。李世民准备起兵反隋时,曾托裴寂说服李渊后方起兵。李渊起兵后建大将军府,任裴寂为长史。裴寂将隋朝行宫中的五百宫女、九百万斛米、五百段杂采、四十万副铠甲送给李渊。李渊称帝后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书右仆射”。赏赐服饰宝玩无数,进御膳,“入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卧内,言无不从。”武德(李渊年号)二年(公元619),命其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兵讨伐刘武周,大败,全军覆没,免去右仆射之职,但“遇待如初”。武德四年(621)复命左仆射并聘其女为赵王元景妃。武德九年(626)正月拜司空。贞观(李世民年号)二年(628),坐“浮屠法雅妖言”案,被免官罚俸,迁归故里。“寂请留京师,帝让曰:‘公勋不称位,徒以思泽居第一。武德之政间或弛紊,公为之,今归扫坟墓尚何辞?’遂归”。不久,乡间有人说他有天子之分,裴寂惧怕,派监奴将那人杀死。为李世民闻知,欲治其死罪,众卿讲情,被流放静州。念其有功诏回京师,卒,年六十岁。

唐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虚衔,无实职。设尚书令、内侍、中书令三职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李渊登基,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行宰相职。故此便无人能任尚书令,而改设左、右仆射,二人同行宰相职。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兵变后,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执掌朝中大权。便命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至八月李世民登基时,裴寂既不是宰相、更不是大将军,亦不参与朝政。《大唐黜官记》中说李世民登基时裴寂身兼三职主理朝政,乃子虚乌有。

唐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可汗颉利常年有战事,互有胜负。武德九年七月突厥寇陇州、渭州,执掌朝中大权的皇太子李世民,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斩卒千余。突厥又寇高陵,遣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击之,大破之,斩首千余。八月,颉利可汗号称将兵百万进至京畿渭水便桥之北。已登基为皇帝的李世民“出玄武门与高士廉(内侍)、房玄龄(中书令)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

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俱至,旌甲蔽野……上(李世民)挥诸军使却而布阵,独留与颉利语。”(此前已遣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与大将军李靖伏兵于敌后)颉利见“上(李世民)捷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遂请和。李世民“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如此看来,李世民睿智大勇,谋略布阵,智勇退兵,并非如《大唐黜官记》所述仓慌迎敌,亦与裴寂无干且大出其洋相。

关于迁都之议,事在武德七年(624)七月,是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且情景亦与《大唐黜官记》所述大异。时因突厥屡犯边镇,某日朝中,有人“说上(李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之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李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于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遂迁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添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顾,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李渊)曰:‘善。’”

贞观元年(627)二月,新皇李世民“以民少更多,思革其弊”,对时任中书令的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遂命房玄龄并省,因山川行便,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留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三人。此事发生在击退突厥可汗颉利半年之后,裴寂并未参与其中。

我这里引证史料,指出《大唐黜官记》所叙说的故事情节与历史有较大差距,并非要否定它,而是说,就该剧的取材与立意,本可以写成一部优秀的历史正剧,给今人以正确的历史知识与现实启迪,提升至更高的美学阶层,就此止步,颇有遗憾。

应约一家之言 权备参酌。

辛卯年岁末于思齐轩

责任编辑 徐丽松